

回乡陪读的母亲们：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家庭与教育^{*}

周飞舟 宋丹丹

提 要：在中国城乡大流动的格局中，农民工家庭亲代回乡陪读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本文认为，亲代回乡陪读的节点与家庭情境密切相关。当隔代抚养支持不足或进入子代教育的关键时期时，亲代中的母亲往往会回乡陪读，其实践形态表现为对子女教育的密集看护。无论身处何种家庭情境，亲代都在祖代的支持下进行的抚育，子代的未来是母亲和家庭进行密集抚育的实质动力。回乡陪读这一社会现象是中国社会家庭中心观的一种显著表现。

关键词：陪读 农民工家庭 家庭中心观

一、引 言

费孝通先生（1983）将代际关系看作社会结构的表征，通过“上对下”的抚育和“下对上”的赡养来观察。在1946年的《生育制度》一书中，他指出生育制度包括生和育两部分，抚育是以夫妇为中心的“双系抚育”。通过教导孩子社会习惯和社会文化，父母完成“把一个生物的人转变为一个社会的分子”的任务，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养成和实现独立的社会分子”（费孝通，2014：173）。在费先生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一种“社会需要”或“功能”主导的分析思路，以抚育为主要功能的家庭不过是个体的成长为社会分子的工具或手段。父母养育孩子是为社会培育人才，等孩子长大了，家庭结束抚育功能，“家庭这三角形已经破裂”（费孝通，2014：169）。

潘光旦先生在为此书所写的序言《派与汇》中指出，费孝通这种功能学派的思

^{*}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2&ZD189；主持人：周飞舟）资助。

路有“我执”和“自画”的嫌疑，即完全用社会需要来解释家庭（潘光旦，2014：58）。费先生直到晚年才对此做出反思和回应，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确没有对个人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个人“是个活的载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实体”（费孝通，2009a：237）；另一方面又坚持说，他强调社会作用的一面并非完全出于西方社会思想的影响，“也有些西方的朋友用西方的学术派别来分析我的思想。无疑，很多是极中肯的，也符合我的学习经历。但是我反复自我解剖，却倾向于认为我这套根本的社会观，与其说得之于西方学者，倒不如说是来自早年滋养我成长的中国泥土，我的思想之根深深地埋在中国的文化里。”（费孝通，2009b：449）

费先生此说的依据是他晚年持续用力地对中国家庭“反馈模式”的研究。他的结论是，西方家庭只有抚育而缺乏赡养的“接力模式”反映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家庭为社会培养成员的模式也反映了西方的“社会中心观”，而“反馈模式”是中国人“心中有祖宗、有子孙而把自己作为上下相联的环节来看”观念的体现（费孝通，1983）。所以，相比于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或“社会中心观”而言，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家庭中心观”，赡养和抚育“一老一小”是家庭的核心使命。赡养是为了家庭，抚育也是为了家庭，当然也是为了社会，但却不能说是家庭的首要功能，也不能说是父母的自觉意识。这应该就是费孝通先生认为自己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心观”思想的关键之处。

费先生的这种家庭中心观主要体现在他对以赡养为主的“反馈模式”的讨论中，并没有涉及抚育的研究。学术界对于家庭中心观的理论探讨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有学者提出用“家”作为方法来补充和完善社会学的“国家—社会”或“个体—社会”范式，以对中国现实的社会现象做出更深入和精神方面的探索（肖瑛，2020；周飞舟，2021a）。本文试图以经验材料在抚育问题上延伸这个方面的讨论，选取当前中国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之一——农民工妇女的“回乡陪读”，来分析这些母亲们的行动逻辑，并力图窥见其观念世界中的行动意义，以此补充中国社会家庭中心观的讨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长河乡^①“回乡陪读”的母亲们。长河乡是位于安徽省南部的一个普通乡镇。近年来，十几家大大小小的服装加工厂出现在长河乡的学校附近，厂里的女工们尽是“回乡陪读”的妈妈。这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县城和中心乡镇的一

① 本文已对所有可能涉及真实信息的地名、人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访谈中若出现对话段落，“访”均指作者，被访者用化名里的单字指代。

种普遍现象。“回乡”指的是她们均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但往往会在某个时间节点改变夫妻双方外出务工的家计模式，一方回乡，女性居多。“陪读”指的是她们会围绕照看孩子学业这一核心任务，重新构建一套生产生活秩序。回乡陪读无疑是母亲们重要的抚育行为，本文将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观察和研究这种抚育方式的行为特征，分析母亲们在采取这种行为时面对的种种因素以及她们对此的理解。

当前中国社会的城乡“大流动”格局使得几乎所有的农村家庭成员都不能稳定地居住在一起，他们总是在生命历程的某个阶段与家庭成员分离，这会带来他们各种人生行动决策时的复杂顾虑。外出意味着可以赚钱养家却不能陪伴家人，回乡意味着团聚却会使家计更加艰难。母亲们就是在这种两难处境中决定回乡陪读的。这构成了我们研究关注的核心。

二、作为一种抚育方式的陪读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大规模地撤点并校，中小学离开村庄，出现了“文字上移”（熊春文，2009）或“教育上移”（叶敬忠，2017）的现象，致使许多农村家长到孩子上学的地方租房陪读（陈锋、梁伟，2015；庞晓鹏等，2017；何影、田毅鹏，2018）。陪读最初被看作是教育政策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陈锋、梁伟，2015）。然而，由于陪读现象成为最近30年农村家庭的常态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政策便显然不能作为主要的解释因素了。一些研究努力寻求体制性或制度性的解释，如有学者认为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使一些家长选择主动将孩子送入城里的学校，并进城陪读（吴惠芳等，2019）；还有学者将其视为农村家庭为了实现阶层跃升所进行的教育风险投资（雷望红，2018），或是城市家庭“精英教育”的剧场效应（王欣、卢春天，2019）。

肖索未和蔡永芳（2014）的研究是这类解释的代表。她们研究了进城务工农民工家庭的抚育方式，认为农民工家庭因其面临的不同城市化机会而发展出“强—弱”分化的城市化取向，这一取向会影响家庭的抚育方式。“强城市化取向”的家庭会模仿城市家庭对孩子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而“弱城市化取向”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成就持开放态度，往往延续“顺其自然”的传统抚育方式。实际上，大部分农民工家庭都无法为孩子争取到在城市长期受教育的机会，待孩子回乡读书后，“强城市

化取向”的家庭也会比“弱城市化取向”的家庭给予孩子更多的教育投入和关注。

关于陪读的社会学研究大都采取了城乡分化或阶层分化的视角，用社会流动的理论来解释陪读行为。在这类研究中，农村家庭的陪读行为被视为期待实现阶层流动而模仿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结果。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隐藏于城乡和阶层差别之下的一个普遍事实，即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实际上是一个超越城乡和阶层差别的现象。陪读是绝大部分有能力的中国农村家庭都会做出的决定，那些没有陪读的家庭与其说是缺乏教育投入的动力，还不如说是缺乏教育投入的能力。有些“弱城市化取向”的家庭子女没有人陪读，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真的对其教育前途持“开放态度”还是在打工交学费和回乡失学的单选题中选择了前者？我们将在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检视和重新回答。

陪读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主要由母亲承担，初中和高中时期的陪读尤其如此。这也引起了学界的大量关注和讨论，研究者们尝试引入“母职”（motherhood）概念对承担陪读责任的母亲们进行主体性理解（赵洪萍，2020；许怡、辛荣，2021；肖索未、汤超萍，2021），因阶层分化衍生出的母职概念体系的内部分化也对陪读研究产生了影响。其中，“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被借用来刻画中国城市中上阶层家庭母亲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抚育方式（陶艳兰，2013；陈蒙，2018；施芸卿，2018）。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希丝（Hays，1966：8—9）在20世纪60年代的专著中提出，指一种“以孩子为中心、专家指导、情感投入、劳动密集、经济昂贵的母亲的抚育方式”，在当代美国社会被广泛接受为“最恰当”的抚育方式。希丝试图去回答，在已经高度现代化、市场化、个人利益驱动的社会中，为何还存在着这种无私、“不理性”的爱？

根据她的研究，17至18世纪是新教观念影响极为深刻的时代，孩子是需被“挽回”（redeemed）的罪人，家长的严苛管教意在为上帝养成坚毅、道德和忠诚的仆人，这构成了“密集”的实质内容。这个时代里，母亲还“隐身”在家庭中，并不引人注目。19世纪由美国中上阶层女性发起的“塑造道德母亲”（the making of the moral mother）运动则强化了母亲的重要性（Hays，1966：29—35）。改革者呼吁母亲改变放任、溺爱的抚育方式，用密集抚育证明自己作为“共和国的母亲”（republican mothers），可以为国家培养出优秀的未来公民（Kerber，1980）。发起者们尤其主张工人阶级的母亲亦要通过转投密集母职的怀抱，为社会贡献应尽的力量（Kerber，1980；Stansell，1987）。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密集的本意指向“孩子的品性”（child's goodness），其目的是为社会培养“良好的公民”（Hays, 1966: 68）。然而母亲们采用此种抚育方式并非本性如此，而是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Hays, 1966: x—xi），是社会功能的需求。这反映出了其方法论的“社会本位”：第一，个体终将从家庭走向社会，家庭是为社会培育公民的摇篮；第二，社会是决定行动者行为方式的主要力量。

密集母职被视为占据主导地位意识形态（Christopher, 2012）。相对而言，多种群体的母职形态被提出用以挑战这一主流话语，如“集体抚育”（collective mothering）（Collins, 1948）、“延展母职”^①（extensive motherhood）（Christopher, 2012）等等。然而，中国学者在试图用母职概念体系对陪读现象进行分析时，遇到了很不同的情况。在上述分析框架中，中国城市中上阶层家庭对应“密集母职”，其他家庭对应非密集母职，农民工家庭在城乡间流动，会因其资源禀赋和城市化意愿的差异而靠近或背离密集母职这一抚育形态。但奇怪的是，一些研究却发现农民工家庭母亲们的抚育也均显示出“密集化”倾向。例如，肖索未和汤超萍（2021）指出，在子女教育的“关键时期”，进城的家政女工往往会选择回乡陪读。在她们的自我认知里，母亲在生活和情感上的关心以及切身的学业监督，是孩子获得学业成功的关键。这与杨可（2018）发现的“城市家庭密集母职向着教育职责倾斜”是同一特征的不同表现。换言之，陪读行为是密集母职这种抚育方式在农民工家庭身上的表现。有研究者将这种情况形容为密集母职在中国的本土化表现（金一虹、杨笛，2015；陈蒙，2018），即在中国社会，无论是何阶层的母亲都会密集地参与子女教育（Fan & Zheng, 2020）。

中国这种超越城乡、阶层的“密集母职”现象提示我们，不能仅仅使用城乡、阶层等体制性和制度性差异来理解母亲们的陪读行为。密集母职概念本身背后隐藏了一些意识形态色彩。但这一概念对理解陪读现象仍然颇具启发意义——如果说密集母职的背后是一种国家中心观或社会中心观的话，那么中国陪读现象的背后是否反映了一种家庭中心观？母亲们对家庭和家庭责任是如何理解的？又是如何与其行动发生关系的？

^① 学者们对此概念有不同的翻译，如“扩大母职”（杨可，2018）、“延展母职”（肖索未、汤超萍，2021）等。需对这一概念进行补充说明。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 2012）认为密集母职在美国社会中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升，女性开始主张工作和抚育都是母职的内容，她们希望通过拓展和重构母职的内涵来挑战密集母职这一主流话语。但在中文研究中，密集母职的概念仍被研究者视为是有效的，并且主导了城乡、不同阶层母亲对理想母亲的想象（肖索未、汤超萍，2021）。

三、研究方法田野概况

本文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安徽省南部的长河乡。它下辖 11 个行政村，总户籍人口约为 3.5 万人。当地的工业化水平较低，农业以粮食作物为主，青壮年多外出务工。乡镇内交通便利，乡政府所在的长河村是全乡的中心地带，学校、商店多集中于此。全乡有 1 所初中和 5 所小学。长河乡隶属于镜熙县，在中小学阶段，有城镇户口或在县城购房的家庭的孩子才能去县城读书。这对大部分农村家庭而言是较沉重的负担，因而他们往往让孩子在乡镇就读。在此村镇格局下，就近入学的家庭理论上无须担心孩子因离家远而被照顾不周，但回乡陪读的母亲们却纷纷聚集到学校周围的服装厂里，早上送完孩子就进厂做工，晚上就出厂接上孩子回家，她们寸步不离地照料孩子的生活、监督孩子的学习，致使整个乡镇服装厂的劳动节奏几乎和学校生活同频了。

为理解该经验现象，回答引言部分提出的研究问题，笔者在长河乡选取了三个服装厂，进行了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还在田野对象的介绍下访谈了其他服装厂的女工母亲们，观察和访谈的内容包括个人生命史、家庭生命史、劳动生活和陪读生活。我们在 2019—2021 年进行了共计两个月的田野工作，积累了 26 个个案。这些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中等水平，夫妻双方都需务工挣钱才能维持家计。需要说明的是，个案里的孩子们都集中在镇上的一所小学和一所初中，大部分陪读的母亲不是因为孩子通勤不便或安全问题而陪读，因为村子都分布在此镇周围 10 至 20 分钟的车程范围内。我们对个案进行整理、分类和梳理后做出了表 1，可以发现如下 6 特征：第一，女工母亲们都以子女就读阶段描述自己的回乡节点；第二，她们的回乡节点大致对半分布在子女的“学前至小学”和“初中”两个阶段，没有子女在高中阶段才回乡的女工母亲；第三，选择在子女学前至小学阶段回乡和选择在子女初中阶段回乡的女工母亲，分别匹配了“没有隔代抚养支持”的家庭情境和“有隔代抚养支持”的家庭情境；第四，无论是何时回乡的女工母亲，在她们认为孩子进入学习的“关键时期”后，都会围绕孩子构建自己的生产生活秩序，进行密集化的抚育。

上述特征分别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观念造成了上述特征？本文的正文部分将按上述两类家庭情境进行分类讨论，选取同类中的典型个案，分析母亲们是如何做出回乡决策的、她们陪读生活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她们如何理解自己的抚育方式。

表 1 长河乡部分服装加工厂的女工总数和回乡节点分布

服装厂名称	女工总数	回乡节点		
		学前至小学	初中	高中
超群服装厂	9	5	4	0
仁恩服装厂	7	3	4	0
扬帆服装厂	5	2	3	0
其他服装厂	5	3	2	0
合计	26	13	13	0

注：（1）当地的服装加工厂均采用“来料加工”的劳动组织形式，即由客户提供全部的原材料和辅料，服装厂按客户的要求完成加工，成品交付客户销售，此种劳动组织形式下服装厂承接的订单规模往往较小，服装厂的工人数也相对较少，大致都在5至15人之间；（2）“回乡节点”中的“学前”“小学”等均指子女的就学阶段。

四、隔代抚养：“关键时期”到来前的抚育方式

当被问及“为什么回乡”时，在孩子学前或小学阶段回乡的母亲都颇费口舌地解释，自己回来这么“早”，是因为家里的祖辈没有办法“带孩子”；剩下的母亲们回答则如出一辙——“因为到了‘关键时期’”，并且用“都是爷爷奶奶带”一句交代了之前的抚育安排。^①这两种回答反映出母亲们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共识：第一，祖辈帮忙带孩子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第二，存在一个大家都承认的“关键时期”，在此时期来临前，母亲回乡会被视为“太早了”；第三，是否存在隔代抚养^②是致使母亲回乡节点产生分化的关键，如果隔代抚养的支持是足够的，那么母亲们有余地等到关键时期回乡，如果隔代抚养支持不够或缺失，那么母亲们就要较早回乡了。

那么，作为优先选择或前提条件的隔代抚养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母亲们的详细讲述说明了缺失的原因各不相同。从她们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是如何看待进行隔代抚养的主体即公婆的，这涉及她们对“家”的理解。下文将通过霞姨和杏枝婆媳二人的访谈回答上述问题，并辅以其他个案加以佐证。

① 该节的访谈引文分别来自：《2019年7月24日霞姨访谈录音稿》，录音编号20190724X；《2019年3月21日杏枝访谈录音稿》，录音编号20190321Z；《2021年4月26日景花访谈录音稿》，录音编号20210426J；《2021年4月29日英春访谈录音稿》，录音编号20210429Y。为避免冗杂，下文凡涉及完整个案写作时不在行文中另出脚注。

② 此处的隔代抚养支持指祖父母的养育和照顾。个案中会出现将孩子交由外公外婆抚养的情况，但这是极少出现的情况，而且当事人往往会强调这只是权宜之策。

相较于田野调查中的其他母亲，霞姨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过得更加辛苦一些：“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尽是我一个人，那会儿我真是又黑又瘦，比现在还要瘦，风都吹得起。他俩小的时候我哪里能想着歇一会儿？我自己生病打点滴都只能在家里打。”

霞姨是1986年生人，瘦高个，家住长河村，目前在距家约500米处的扬帆服装厂务工。大女儿在镜熙高中读高二，两个小儿子是双胞胎，读小学五年级。她从15岁起外出务工，在外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小彬，19岁就结婚了。生大女儿时她从宁波回来待产过一段时间。大女儿4岁时她怀了双胞胎，又回来在家待产，自从生下双胞胎后就“一直在家里，一直没有出门去过”。^①丈夫是一名木匠，一直在外务工。

虽然婆婆健在，但霞姨的抚育经历中很少出现婆婆的身影。由于霞姨生完两个儿子后实在忙不过来，大女儿短暂地让奶奶带过一段时间，但之后基本上就是她一个人带孩子了。她开始进服装厂务工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两个儿子还小时她根本无暇做工。

访：那个时候不能出去做工么？

霞：哪里能想得到？只能在家，如果时气不好，他们总生病……哎呀（叹气）孩子们小的时候也都过来了，现在都忘掉了，只记得就没有歇着的时候。

访：孩子的奶奶不能帮你么？

霞：……（沉默了一会儿）那个时候她不还是天天到外面去挣钱？（笑）又要种那么多田和地。

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霞姨对于让婆婆帮忙带孩子的事情态度很犹疑，她给出的解释是婆婆要“挣钱”。那么为什么孩子的奶奶会把外出挣钱这件事情的优先性排在照顾孙辈前面呢？当访谈完奶奶杏枝后，我们会发现她对做事情的理解并非只是“挣钱”，这件事情和照顾孙辈对整个大家庭都很重要，甚至比后者更重要。

在儿媳的口中，杏枝是位性格有点刚强、做事情很利落的老人。虽然已经75岁，但在种田之余，她还经常外出做小工^②，家里家外都能收拾得妥妥帖帖。杏枝的丈夫几年前过世，去世前把总共4间瓦房的家分了，三兄弟作彬、立彬和小彬一人分得一间，杏枝留得一间。此时，儿子们基本上都已经成家立业了，这几间小瓦

① “出门”为方言，意指外出务工。

② 指出去打零工。

房是“给他们落脚的地方”，等要结婚时还是要自己出去盖房子的。杏枝说丈夫看病的钱主要用的是老两口的积蓄，儿子们补了剩下的钱。丈夫走后，她把丈夫留下来的钱全分给了儿子们。

两万七千块钱，我全都给他们了，我就只留了几百块钱零用，正好又种了点棉花接上了。作彬家爸走了之后呢，我管我自己，他们年年都给、年年都给，我不要。

为了帮助儿子们成家立业，杏枝把钱全分了，“自己管自己”，“不用他们负担”，还为儿子们种点田地提供口粮。大儿子作彬是三个儿子中唯一读出书来的，在镜熙高中当物理老师，算是城里人。

作彬跟我讲，说不用他们（其他两个儿子）负担（我），我到城里去住，我没有去。不是还有这么多孩子（孙子）都在家里^①？他又只有一个孩子（孙子），我就没去。他们脱产^②的还是要比这些做庄稼的要好一点。住在村里的话，哪怕不照顾孩子，有时帮着做一些零碎的事情，儿媳们不也轻松一些？

大儿子为两个弟弟考虑，觉得自己是家里唯一读出书来的人，想要承担对母亲的养老责任；杏枝为两个小儿子考虑，觉得自己不去城里住着，在家里对他们来说多多少少算一个帮手。虽则大哥提出要给母亲养老，两个弟弟也坚持给杏枝抚养费，通通被她拒绝：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呢？他们的孩子都是要读书的，负担也重。我去年在门口做工，也挣了5000多块钱，我自己能顾得过来自己，就索性都不接。我说我要是干不动活儿了、需要用钱的时候呢，我就找你们要，一碗水端平。

因此，她是通过自己外出挣钱来保证自给自足，至于孙辈们，因为孙子们的妈妈都可以在家里，所以“平时要是有空就去帮着望望”，等到“家里门口的田都要

① “家里”指在村里。

② “脱产”为方言，指不干体力活儿的人。

开始种了、没有空了，就不去”。

从婆婆杏枝的角度来说，目前的生活既不给儿子们添负担，又能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从儿媳妇霞姨的角度来说，婆婆这种做法她完全理解，“因为孩子多、兄弟多，上人也难做。”^① 她现在在家住着没有去哥哥那里养老，也是想着能够帮自己家一把，每个儿子家里都有孩子，没有哪个儿媳妇可以要求婆婆只照顾自己的孩子。从霞姨讲述怎么让婆婆去给照顾自己大女儿中，我们更能体会到多兄弟家庭中老人提供隔代抚养支持的为难之处。

霞姨的大女儿今年读高二，因为两个儿子还小，丈夫又外出务工，她没能去县城里照顾女儿。当问到女儿高三时她的打算，她如此说道：

是三个人的老^②，我也肯定不提出来，要是能提出来我高一就让她帮忙去带孩子了。我大哥一直要接妈去他家住，我妈说不去，这样就行了，我大哥就随了老人的心思。最近大哥问她：“静静^③要读高三，你不一起上去^④帮着照顾？”既然大哥这么说了，我还不索性就这么张罗？又不是我提出来的，要是我提出来的，我要求肯定也过了分，三个人的老。他这么讲，我还不正好就乐意？

从上面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霞姨在这件事情上顾虑重重。虽然她很想让杏枝去照顾女儿，但这个要求决不能由她提出来。在此之前大哥就说过让杏枝去城里住，但被杏枝拒绝了，她的考量晚辈也都清楚。如果此时自己主动提的话那就是“要求过了分”，因为这是“三个人的老”，言外之意是她不能因自家的安排要求兄弟家和母亲为自己付出太多。这件事情只有大哥提出来才算名正言顺，她也就乐见其成了。大哥的考虑是，杏枝这会儿进城住着不仅可以养老，还可以陪一陪孙女，而且老二家的大儿子明年中考后也该进城读书了，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这也是三个儿子达成的共识。

从霞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杏枝之所以没有参与隔代抚养，是因为儿孙太多，没有办法兼顾，索性谁的也不管，只是帮忙种点儿地，救点儿急。这鲜明地显示出，

① “上人”为方言，指家中长辈。

② “老”是方言中对“老人”的简称。

③ “静静”为霞姨大女儿的名字。

④ “上去”为方言，指进城。

虽然早已经分成四个核心家庭，但是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养老、抚养等责任的分配仍然是一个紧密的家，以至于每个核心家庭和老人发生关系的时候都要把其他核心家庭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老人则更是如此。“分家”绝不是分成了几个彼此独立的核心家庭，而是组成了一个共担养老和抚育责任、“家中有家”的大“家”（周飞舟、余朋翰，2022）。

景花的情况与霞姨类似。丈夫有一个弟弟，考取大学后就在城里安家了。她24岁时同丈夫结婚，儿子1岁时她随丈夫外出务工，孩子放在奶奶跟前带着，但儿子小学五年级时，“在那边弟弟的老婆也打算生孩子，就叫我家老人去帮他了”。婆婆进城住后，景花就一个人回乡带儿子了。她在长河中学旁租了两间房子，每天早上5点30分送儿子起床早上读，然后进厂干活儿，周末就带儿子回家。

英春面临的家庭境况相对简单一点。她19岁刚嫁过来那一年，公公因车祸去世。她跟丈夫在家尝试过养殖业，但“后来全亏掉了，就出去了”。早年婆婆在世时，她跟丈夫外出务工时会把大女儿放在婆婆跟前，女儿9岁时婆婆因病去世，她就彻底回乡自己带孩子了。

上述三位母亲都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但在孩子的学前或小学阶段她们就彻底回乡了，主要是因为缺少隔代抚养的条件。从家庭结构和状况来看，缺少隔代抚养主要是两类原因。霞姨所讲述的多兄弟家庭祖辈难以提供完备的照料支持是一种典型情境，此次田野调查中的乐春和群夏也同属此类。另一类情境是祖辈去世或身体不好。英春是因公婆都去世了而客观上彻底失去了隔代抚养的条件。嘉宁也同样如此，婆婆早年就去世了，公公身体很不好，她同时承担起了家庭的抚育和养老责任。基于此，本文将这类母亲面临的情况归纳为“隔代抚养支持不足”的家庭情境。这类家庭的抚育职责主要由亲代中的母亲承担，母亲们往往被迫返乡，虽然她们也称自己是在家陪读，但是她们不是“主动”回来的，原因是无人抚育孩子。

回到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当一位母亲需要做出具体的抚育安排时，她所面对的家庭情境是怎样的？被她纳入考量的家庭范围有多大？本节的个案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做出回答。第一，农民工家庭往往面对生计负担和抚育职责的双重压力，为顾全生计，在母亲的考量中，家庭中的祖辈是承担抚育责任的首要人选，祖辈同样认可这一考量。第二，基于第一点，身处多兄弟家庭中的母亲会和祖辈一样，将丈夫兄弟们各自的核心家庭纳入考量范围之中。因各个小家庭对隔代抚养的需求时间和程度不同，每个核心家庭只能在它最需要的时候向祖辈寻求帮助，而不能完全地

“霸占”祖辈的抚养精力，何况祖辈还惦记着挣点钱以减轻子代的养老负担。由此，多兄弟家庭往往会面临隔代抚养支持不足的情况。本文正是试图通过这类个案，反向证明农民工家庭抚育方式的一大特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隔代抚养是被农民工家庭优先选择的抚育方式，父母尤其母亲并非家庭中抚育孩子的唯一责任人。

五、回乡陪读：“关键时期”的来临

显而易见的是，“隔代抚养支持不足”并非大部分家庭的常态。^①对于那些顺利进行隔代抚养的家庭，隔代抚养会持续多久？母亲会参与进来吗？会在何时参与进来？是怎么参与进来的？

彩华是超群服装厂的一位女工，1974年生人，说话如连珠炮般：

你说家长带孩子怎么带才算好的呢？我家这一个，就是属于那种心态太好的，太好得让人受不了。她总是考得好考不好就都那样了，从来也不急。

她口中油盐不进的是小女儿。她在女儿读初一时回来陪读，丈夫目前在福建务工。彩华结婚后开始外出务工，因为实在是没有出路了：

在家做什么呢？我刚嫁过去时他家里难，一间土房子，就想盖房子，家里的喜事又全部都做到一起去了，又嫁妹、又生孩子、又做屋，家里的钱不够，还去借了贷款，借了就要还，在那个年代几万块钱是不得了的。家里欠了6万块钱的债，6万块你就只有出门。老一辈只管张罗事情，又很要面子，后面的事情他们不管。为了这些生活就要往外跑。

在她看来，夫家境况十分艰难。尽管公婆张罗了儿子和女儿的婚事，但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还欠下不少的债务，外出务工是唯一的选择。这一阶段，挣钱是

^① 该小节的访谈引文分别来自：《2021年4月26日彩华访谈录音稿》，录音编号20210426C；《2020年7月27日松平访谈录音稿》，录音编号20200727S。

这个家庭的首要目标，亲代根本无暇顾及孩子。但在女儿上初一时，彩华毅然决定回乡。与上一小节的家庭不同，彩华回乡陪读是非常主动的行为，她说这是大儿子和她商量的结果：

他爸爸不同意我回来陪，但我觉得大儿子在念书这件事情上讲得是有道理的，就回来了。她是个女孩，她奶奶没有帮她养成那种好习惯，成绩不好，初中又是关键阶段，要考高中，她未来要是没有书可以读，会埋怨我。

但回来陪读也并非她突然有的想法，从上面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彩华对奶奶在孩子的教育上颇有微词。在女儿读小学三年级时，彩华第一次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她上小学三年级时，我跟我家那个当小学校长的表哥说，我家孩子成绩不好。他问我不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就讲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只晓得她成绩不好。他说我找个老师帮你带一下。那个老师就问啊，你家女儿是哪门课程成绩不好？我说应该是数学。他就问我家女儿，20 减掉 7 等于几？我家孩子就这样掰（手指）、这样掰，数了一上午（摆手，笑）！搞笑吧？就是这么个成绩。从那以后每天就送到朱老师那里去补习。那个时候想着，还挣两年钱、还挣两年钱，大概到了初中再回家，后来我也就又把她这么丢在了家里。

在彩华看来，女儿成绩差和奶奶的娇惯、“放养”有着直接关系：

她奶奶常常跟老师说，我家孙女还小，不能打不能骂，所以老师不敢讲不敢教育她，就养成她那样懒散的习惯。放学后，奶奶把孩子接回家了就让她在家看看电视，也随她去了，反正老师也不管她，她就总觉得去幼儿园是去玩儿的。

补习班老师天天帮我带着，但他又不喜欢她奶奶天天去那里找人聊天。老师就跟我讲，让你家老人来晚一些，不然孩子学习时她一直打扰他们。我家老人肯定也就有些委屈，我在家里带孩子我还要看你补习老师的脸色？后来她就不去接送了，让孩子自己走路上学，孩子也受苦。

尽管知道女儿成绩不好，也意识到了奶奶疏于对孩子性格和习惯上的管教，彩华还是想着小学还不是“关键时期”，而且在表哥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好帮手，这样她还能在外面抓紧“挣两年钱”。她从二十年前开始就跟丈夫一起在福建务工，本来两个人都是进厂做裁缝，慢慢地他们就出来单干了。她在石狮自家的出租屋里置办了整套机器，自己在各种淘宝网店研究“爆款”衣服版型，丈夫负责在外采购布料、拉链、扣子等原料，一旦有人在淘宝网店上下单他们就紧赶慢赶地做，当天用快递发出。她自嘲这是一个“山寨网店”，但凭借着这个网店的收入，他们已在镜熙高中旁买下了一套价值 80 万元的房子。为了回乡陪读，全部机器都被闲置了。

她始终强调初中是“关键时期”，“人家都说要抓一把、抓一把”。但说是回乡陪读，彩华却并无一个明确的教育期待，她说她只希望“我家孩子现在还能扶得起”。平时孩子的成绩也是丈夫跟老师交流，“然后再给我传”。她说：

也不晓得要讲什么好。作业也不用我管，她讲她做完了，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和彩华一样，松平也是主动回乡陪读的一员。她早在大儿子读初一的那一年就回来了，现在轮到给小儿子陪读。松平 20 岁时认识了丈夫，22 岁结婚，生下大儿子之后就交给爷爷奶奶抚养，自己跟着丈夫去上海打工。等到儿子上初一时，夫妻俩觉得“孩子读初中正是顽皮的时候，以为在家里能管得到一些”，再加上爷爷去世，奶奶一个人在家，夫妻俩想用积蓄回来盘个店面做做生意，以后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

他俩没有想到的是，初一还往家里拿奖状的儿子，初二就变成了老师口中“翻墙出去上网”的坏学生，成绩也是一落千丈：

第一年我们回家时成绩好得很，班上第 4 名，也拿了奖状回家。初二下半年就变掉了，跟人家孩子一起学坏了，半夜翻墙出去上网！

自此以后，老师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往家里打，夫妻俩一趟又一趟地往学校跑，对儿子打也打过、骂也骂过、劝也劝过，但儿子就好像“着了魔一样”。老师甚至和家里联合起来想吓唬吓唬他，就说让他带着铺盖回家，希望他能幡然悔悟，没想到弄巧成拙：

哎呀，这个事情就别提！在家歇了一个多星期，老师又主动打电话来问，不也就是担心？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不去念。你说说，还真是对他没辙吧。后来老师也不晓得怎么办，家里呢，又要劝他读，哪还真的就不念了？

凭着之前的底子，儿子最终还是考上了一个普高。那个时候小儿子刚出生，丈夫又因为店铺生意不好出门务工去了，家里家外全靠松平一个人张罗。大儿子的读书经历对松平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教训，她意识到仅仅是自己在家还不够，还需要对孩子进行切实的看管。她坚持一定要在长河中学旁边租房子，让孩子出来住。

访：他要是到这边来读书，您要来租房子，就要两头跑？

松：这样他就不会跟一个宿舍的孩子们学坏！我想到他哥哥，那个时候如果说我去陪他了，最开始就在我们这里住着，他也绝对不会跟人家同学半夜出去玩，是吧？以后就不会成了那个样子。养这个孩子时，无论如何，我晚上要让他出来住，然后我来陪着。

在松平的认知里，大儿子之所以在初二时变得叛逆，主要是因为在学校住宿被其他孩子带坏了，如果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学校的住宿生活被她视为一个大染缸，她能为小儿子做的努力就是尽量让他脱离那个环境：

孩子们容易学坏，这肯定都是正常的，我这样来陪，为了什么？我就只能给他提供这样好一点的环境。

从彩华和松平的讲述来看，相较于上一小节的母亲们，她们在没有遇到隔代抚养支持不足的家庭情境下选择主动地回乡陪读。这是因为她们意识到了隔代抚养的“不足”——这里的不足并非客观意义上的，而是主观意义上的。彩华经历了女儿三年级的算术事件，松平经历了大儿子初中阶段的成绩滑坡，她们自身的体认和经验促使她们在关键时期彻底接手孩子的抚育。与此同时，这两个案例表明，随着祖辈的衰老，这类家庭本身也已经行进到可以回乡安家立业、需要承担养老责任的阶段。表2结合案例简要总结了隔代抚养支持情况不同的家庭在各阶段的抚育方式。

表 2 隔代抚养案例的分类

	隔代抚养不足		隔代抚养足够
	多子家庭	祖辈去世/身体不好	
小学	亲代抚养	亲代抚养	隔代抚养
初中	亲代抚养	亲代抚养	亲代主动回乡
文中所提案例	霞姨、景花、乐春、群夏	英春、嘉宁	彩华、松平、带娣

这里需仔细辨析个案中母亲主动回乡陪读的心态。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在女工群体中形成了一种初中是“关键时期”的共识。多位访谈对象都提及，中考意味着有些孩子要被分流去上职业高中，这在她们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惨淡出路（例如卫老板，录音编号：20210425W；梦燕，20210425M）。两位母亲显露出的“主动”背后也并非是对孩子较高或较明确的教育期待，而是她们朴素地接受了这一共识，心情开始变得格外紧张，并且觉得自己需要为了孩子的未来做出切实的努力，从而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对孩子学业的管教中。彩华和松平的讲述已经初现“密集”的端倪，她们代表了田野中另外 13 个正在经历子女进入初中的家庭的抚育方式——密集看护。下一节，本文将详细分析女工母亲们的陪读方式，尝试讨论中国家庭抚育时在教育上呈现出的“密集”与“密集母职”的出入。

六、密集看护：女工母亲的陪读方式

上文已试图论证，陪读母亲的回乡节点随家庭情境的差异而不同，但无论是主动回乡还是被动回乡，母亲们都会走上自我认知为陪读的道路。既有文献尚未涉及、也是本文需借此现象进一步的追问：母亲们的陪读陪的到底是什么？她们如此密集地投入孩子教育的具体表现和动力原因是什么？本节希望以带娣和景花为典型个案，观察和分析田野中的母亲们密集抚育的具体内容，以及这种抚育方式体现出的特定观念。^①

女工们时常在背地里议论服装厂的卫老板，卫老板也从不避讳在她们面前谈论自家女儿成绩差。景花有一次顺着这个话题认真分析：

① 该节的访谈引文来自：《2021 年 4 月 26 日景花访谈录音稿》，录音编号 20210426J；《2020 年 4 月 27 日带娣访谈录音稿》，录音编号 20210427D。

他们夫妻两个平时都要张罗服装厂，管孩子管得也少。我们穷也就穷吧，至少能管得到孩子，没有大本事，只望着孩子能念出书来。

在景花看来，卫老板的女儿之所以成绩不好，是因为平时生意太忙没能管孩子，而自己作为工人，虽然挣不了那么多的钱，至少能够管住孩子。这句话显示出母亲们心目中理想的陪读状态——要尽可能管住。在访谈中，每当正面提问母亲们陪读陪的是什么，总能得到类似的回答（例如乐春，录音编号：20200717）：

陪是陪什么呢？吃、喝、穿、洗衣服，只陪这么个事情，别的事情都陪不到。

但一旦细细地问起她们的时间安排，便会发现她们的陪读远不止这些锅碗瓢盆。超群服装厂从每个周五下午就会变得冷清，车间里只有一两位女工在，问别的女工去哪里了，她们笑道：

孩子一放学她们就跟在后面撵回家去了！

长河中学周一到周四都是从早上 5 点 50 分开始上早读，晚自习也要上到 9 点，周五下午放学早一点，学生们可以在家过一个完整的周末。每到这时，妈妈们反而更紧张，必须在家看着，班也不能上了。

带娣出生于 1983 年，她的陪读对象是正在上初二的儿子。她对儿子的管教主要集中在“不让他玩手机”，在她看来自家的孩子已经“玩手游玩上了瘾”。玩游戏的事情是自己先发现的：

娣：他在楼上上网课，我也就没有看着他上。我们也看着他一天到晚都在楼上，谁能知道他自己悄悄做一些小动作？现在晓得后就看紧一点，但看紧之后也还是没有成绩。你叫他看书他看书，你叫他休息他休息。

访：怎么发现他玩游戏的？

娣：我们也晓得他在楼上不对劲，本来天天一样的时间下来，但这几天到了时间总没有下来，我搞突然袭击，就这么抓着了。

带娣表示孩子迷上手机是自己一时大意，虽然那会儿自己也在家没有进厂来，但她也会打点零工。

陪孩子虽然也是讲陪孩子，但是有些事情不也要做一做？也不能硬生生地坐在那里陪他，也想做一点事情挣点零花钱。正好他爸在对面做砖匠，跟人家一起承包的事情，我也就跟着他一起做一会儿小工，有时候回家喝水、做饭的时候可以望一望他。

那段时间为了让儿子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带娣一般就让他住在楼上自己房间里写作业，没想到“没看住他他就想方设法玩手机”。

儿子读初一时，带娣有的时候还会在厂里待着，自从发现儿子贪玩之后，她就都把货带回家做了。

现在他写字我就让他到楼下来写，但用机器做衣服肯定会有点吵，他可能也写不进去，但是你不看住他也没有办法。

在她身边写作业的儿子表面上是十分安静的，带娣却发现依然没什么效果，成绩虽然算不上差，但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上个普高都很勉强。

看都看不住，反正他一天到晚也都坐在那里写作业，就跟你做衣裳一样，就坐在那里，坐在那里思考，但他到底是在思考学习还是在思考玩，这你就知道了，不晓得他在做什么。

景花家在陇寨村，距离长河中学有约 15 分钟的车程。她说一到周末儿子就闹着要回家，自己也只有跟着走了。

访：您不回家的话不行么？

景：我就怕他出去玩儿，他有时候偷偷摸摸出去，你要是不去找他，他恨不得两三个小时都不晓得回来！我就是不想他那个样子。邻居家有两个孩子跟他一样读初一，他们有点喜欢玩手机，家里爷爷奶奶又不管，我就怕他受影响。

其实家中爷爷还在，单说照顾孩子肯定没有问题，但景花觉得自己一定要回去。在她的形容中，儿子是一个没那么能坐得住的孩子，经常写着写着作业就跑出去玩儿了。这还不是她最担心的，她主要担心的是邻居家的孩子爱玩手机，而自家孩子可能会受影响。这也是景花不想让儿子住校的主要理由：

没有想过让他住校，也就是想着万一他不听话，在学校里要是有顽皮的孩子，恐怕他在学校里跟那些孩子玩坏了。毕竟他是男孩子，还是要来陪一陪，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我也讲了，书我也替你念不了，现在要靠你自己。只是说饮食起居陪一陪你。难诶，都是一样。

景花对于脱离了家庭管教的学校住宿生活有诸多不好的想象，她需要尽可能地将孩子与那样的环境隔离开。她对儿子的管教更是全方位的。刚回乡时，她发现了儿子许多不好的习惯，比如“写字时看电视”，或者就是写着写着就不见踪影了。景花说，她就在家里看着儿子把这些习惯一点一点地给改了：

写字看电视，我就把电视收掉不让他看，到人家去玩儿我也不要他去玩儿，前面跑我就在后面追（笑），现在就稍微好一点……反正他头脑有，就是懒。

儿子进初中后，她主要要管住儿子“看电视”“玩手机”“出去玩”这三件可能会影响他学习的事情。疫情期间，为了方便儿子上课，她买了个新电视回家。没想到让儿子对电视“更着迷了”，疫情结束回学校后的第一次考试就跌出了班级前十。她说他之前从来没考过这样的名次，但她一时忍住了没有问。终于到寒假时母子俩因为看电视的事情大闹了一场：

他去年期末考试一下子跌了那么多，我也一直没有讲。我也问，问他你是怎么了？他也不说，你也不晓得。在家里的时候呢，他又晃来晃去，又想要出去玩儿，我就生气。寒假时，我经常看到他在看电视，我就来气，他也发脾气，跟我对着干，然后我就打、到处追，他就跑，你哪里能撵得上他（笑）？

寒假时景花就更没有进厂了，而是在家陪着他，却发现儿子对考砸了这件事情

似乎无动于衷，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想看电视就看电视，她更着急，怕他“心思不在读书上了”，没忍住发了脾气，冷静下来后又跟他约法三章：

他写完字晚上也可以在允许范围内看看电视，但还是要管着。

除电视外，手机也被她视为天敌：

好大的影响，那个手机真的就是不能玩，他在玩什么我也搞不太懂。我家孩子也不太玩，他就是经常要看一看，好像是在跟人家聊天。我怕影响他，就不想让他看。

她说儿子在家的时候她“甚至有点紧张”，生怕他有各种各样的小动作，她总是忍不住要说他，又怕自己管得太多会起反作用：

他一回家，我就生怕他出去玩儿了，我就要跟在他的后面看着他，但我想这样可能会导致他更加叛逆，我也不想讲，但我不讲呢我又过不了我的心。

这种矛盾又紧张的心态在她那里总是反复出现：

我就是有点不放心，反正他乖也还是叫乖，我还是不放心。那天说要考试，我就没有在厂里做事，跑回家看着他。他在楼上喊我：“妈，你怎么不去厂里做事？”我讲：“我想做，又不放心你，怕你出去玩。”他讲：“不出去玩儿。”我就说：“那我今天也不想做。”陪读是真的很难陪，我家的还比较乖，但我也操心，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爱操心了点。

在这段对话里，她描述了一个日常的情境：儿子因为要考试了在家复习，本不是双休日，她也还是回了家，儿子对她承诺说自己不会出去玩儿，她也依然是不放心。追究起动机和原因，她说不出个所以然，哪怕自家孩子在自己看来是温顺听话的性格，她也总是“不放心”和“爱操心”。

从本节和上节的四个个案，我们尝试窥见母亲们陪读的心态和意义。带娣和景

花的讲述尤其传递出了一种对孩子教育的紧张感。由于自身所受教育水平有限，个案中的母亲们对孩子的学业没有能力形成清晰理性的认知，但她们坚持对孩子进行一种非常典型的女工母亲陪读方式——密集看护。首先，这会表现为对孩子一切行为的监管，尤其是不能让孩子靠近手机、电脑这些被母亲们视为可能会影响孩子学习的东西。其次，她们的看护会表现为尽可能地与孩子待在一起，大部分的母亲会如景花一样表示自己在旁边也只是坐着，但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放心。她们对孩子的照料体现出的不仅是责无旁贷，更是“密不透风”。母亲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监管，不让自己的孩子被别的事物分了心，从而“心思不在学习”上。她们的管教路径是希望通过切断外部的诱惑而保证孩子的心思集中，从而可以成绩优异。但是这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由于她们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所以心里也没有底。但如此密集的陪伴让母亲们心安——至少孩子没有出去乱玩儿，没有变坏，也有可能是孩子未来向好的开始。

由此可见，陪读母亲们密集抚育的核心指向是孩子的教育，孩子在母亲面前简直“无所遁形”。她们明知自己的一些做法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但一颗心忍不住全都在孩子的身上。当被问到“这么多年为了孩子不是在打工就是在陪读，有没有想过自己”时，彩华很错愕，然后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好像没有自己这个概念，他们（指两个孩子）就是我”（录音编号：20211106C）。从她们的主观视角出发，孩子当下的教育与遥远的未来密切相关，而孩子未来就是自己的未来、是家庭的未来，孩子未来的安乐无忧是她们、是家庭生活本身的意义所在。

七、总结与讨论

当前的中国是“流动的中国”，农村中2亿到3亿的农民工处在流动的状态中。这些流动人口的家庭除了短暂的春节外，很少能够团聚。流动家庭中的孩子们很多都是在爷爷奶奶的抚育下度过幼龄和小学阶段，缺少父母的陪伴。儿童的抚育变成年事已高的祖父母的任务，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独特家庭现象。父母没有陪伴，不等于没有尽到抚育的责任，这与西方非密集母职的情况看起来相似，二者虽都是发生在社会中下层的抚育现象，但是却存在本质的差别。

首先，祖父母的抚育是除了父母之外最为可信、可靠的抚育，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不可替代的，非但父母这么认为，祖父母和孩子们也这么认为，其本质仍然是“家”内的抚育。就像本文中的案例所显示的，即使分了家，父母和子女也永远是一家人。在中国，无论城乡，无论社会精英还是引车卖浆者，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只要条件允许，总会成为幼龄儿童的第一看护者。所以，中国的母亲们产假结束就返工上班。在西方的“密集母职”论者看来，这好像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对孩子也不公平，这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家”与“家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人的家由最亲密的“一体”关系组成，父子一体、母子一体，虽然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不是一体，但却是这个文化中最为亲密的非一体关系（周飞舟，2021b）。在这个意义上，亲密的家庭关系支撑起了抚育，使得年轻的母亲们在抚育期仍然可以工作，维持了家庭收入的稳定性。所以，隔代抚养成为第一选择就是中国家庭本位的文化仍然充满生命力的重要表征。

其次，母亲们“密集”的投入出现在孩子的学龄尤其是中学时期，其密集程度完全不亚于“密集母职”所显示的“密度”，在城市中如此，在农村也是如此。本文案例中的母亲们那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的陪伴既是时间、空间上身体的陪伴，更是一种心灵上的陪伴。这种“陪”虽然只是“陪吃、喝、穿、洗衣服”而没有“读”，与城市中母亲的陪伴稍有不同，但其心态上仍然是“读”，是“教育”。所以，中国如果也有“密集母职”的话，其实就是“密集教育母职”，只是这些回乡的母亲们没有能力做“母职经纪人”而已（杨可，2018）。她们自己缺少足够的教育，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没有十足的信心，但是其满心向往的都是教育和读书，因此不停地与手机、电视争夺孩子的时间。案例中景花和儿子的那段对话最能代表陪读母亲的心态。儿子不上学，她就不去做事。儿子问你为什么不去做，景花说怕你出去玩。儿子说：“我不出去玩儿。”景花就说：“那我今天也不想做。”一个“那”字、一个“也”字，透露出景花的平实但令人动容的母爱。陪读现象遍布城乡的学生家庭，对于小县小镇的初中生们来说，有潜力考上好学校的能有多少呢？由此可见母亲们“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不一定是为了结果，只是人生的责任和使命。

最后，让我们回到费孝通先生晚年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费先生在《日译〈生育制度〉序》一文中谈到自己对中国人赡养行为的赞扬时说道：“我这种社会观并不是我的创造，它存在于亿万中国人的心头，他们不一定能用语言来说，但是他们却用行动在实践。凡是碰到不符合这种社会观的事，他们就会感到别扭，感情上过不去。我在香港讲的那篇‘老年赡养问题’里，就用‘前有祖宗、后有子孙’的社会

观来指出中国家庭结构的特点，也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区别所在。”（费孝通，2009b：449）本文就是接着费先生的用意，探讨“后有子孙”的抚育行为中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的抚育与西洋文化中为“社会”培养社会成员不同，是为家庭培养成员。在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孝悌忠信、尽职尽责的家庭成员也会是忠诚热忱的国民的一员。而对于回乡陪读的母亲们来说，陪读既是在尽家庭的责任，也是在实现她们所理解的生命的意义。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可能会觉得这种密集的陪读行为也是某种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但是这些母亲们所感受到的生命意义却是田野调查中传达给我们的最为真切的东西。陪读当然是在陪孩子，但也算是孩子陪自己，母子本来就是一体而不可分的。我们还是用一小段访谈材料结束此文，这是和一位陪读母亲群夏的问答（录音编号：20210424Q）：

访：但其实您也可以让孩子在家读书您出去打工吧？

夏：没有那个想法，就是要看着他们，我情愿我自己在家门口少挣点钱，但是要把他们看好了。觉得一生过得太累了，希望他们对我能有点回报。他们要是能念好一点，将来我们在他们身上也就无忧无挂了。

参考文献：

- 陈蒙，2018，《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理想母职叙事——一项基于上海家庭的质性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 陈锋、梁伟，2015，《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家长陪读经历及其影响研究——基于甘肃华县的实地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费孝通，1983，《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2009a，《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费孝通全集》第1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9b，《日译〈生育制度〉序》，《费孝通全集》第10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14，《生育制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何影、田毅鹏，2018，《农村陪读迁移群体城市适应与市民化取向分析——基于东北地区H县陪读家长的考察》，《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金一虹、杨笛，2015，《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
- 雷望红，2018，《阶层流动竞争与教育风险投资——对甘肃宁县“陪读”现象的解读》，《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 潘光旦, 2014, 《派与汇 (代序)》, 费孝通著《生育制度》,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庞晓鹏、龙文进、董晓媛、曾俊霞, 2017, 《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与家庭经济条件——学校布局调整后农村小学教育不公平的新特征》, 《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 施芸卿, 2018, 《当妈为何越来越难——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母亲”》, 《文化纵横》第5期。
- 陶艳兰, 2013, 《世上只有妈妈好——当代城市女性的母职认同与实践》, 《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
- 王欣、卢春天, 2019, 《农村陪读家庭资源传递及其影响——基于“陪读”的个案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 吴惠芳、吴云蕊、陈健, 2019, 《陪读妈妈: 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新特点——基于陕西省Y县和河南省G县的调查》, 《妇女研究论丛》第4期。
- 肖索未、蔡永芳, 2014, 《儿童抚养与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社会文化调试》, 《开放时代》第4期。
- 肖索未、汤超萍, 2021, 《流动的母职: 乡城迁移中的母职协商》, 《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 肖瑛, 2020, 《“家”作为方法: 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
- 熊春文, 2009, 《“文字上移”: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许怡、辛荣, 2021, 《流动中妇女的母职实践与主体重塑》, 《社会发展研究》第4期。
- 杨可, 2018, 《母职的经纪入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 《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 叶敬忠, 2017, 《作为治理术的中国农村教育》, 《开放时代》第3期。
- 赵洪萍, 2020, 《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 以“家为社会田野”的叙事研究》, 《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 周飞舟, 2021a,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 《社会学研究》第6期。
- 2021b, 《一本与一体: 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 《社会》第4期。
- 周飞舟、余朋翰, 2022, 《家中有家: “分家”的理论探源》,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Christopher, Karen 2012, “Extensive Mothering: Employed Mothers’ Constructions of the Good Mother.” *Gender & Society* 26 (1).
- Collins, Patricia Hill 1948,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Fan, Yunxia & Xinrong Zheng 2020, “A Division of Labor Perspective on Mothers Who Accompany Their Children’s Study—A Case Study of Student Guardianship among M Town’s Working Familie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1 (1).
- Hays, Sharon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erber, Linda Kaufman 1980, *Women of the Republic: Intellect &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Stansell, Christine 1987, *City of Women: 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1860*.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罗 婧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LUMN

New-Type Urbanization

Moth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Accompany Children: Family and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Zhou Feizhou & Song Dandan 1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urban-rural migration, it is commonly observed that parents from migrant worker families often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to suppor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iming of moth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support their children is closely tied to the family’s situation. When there is insufficient skip-generation caregiving or when the crucial phas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begins, mothers often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to accompany their children, and this practice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nsive care for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Regardless of the specific family circumstances, parents raise their childr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randparents, and the children’s future serves as the primary impetus for the intensive nurturing provided by mothers and families. This social phenomenon illustrates the prevailing family-centered perspective in Chinese society.

MONOGRAPHIC STUDY

New Journey and High-Quality Employment

Precariousness of Digital Labor: Diverse Construction of Precarious Wo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Liang Meng 25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of precarious wo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Dra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labor and comparing varied employment models within the Internet industr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ternet enterprises have developed diverse informal employment models. These models include implicit labor dispatch for technical posts, distribution employment for sales posts, and explicit labor dispatch for logistics posts. This has fundamentally resulted in diversified and segmented worker subgroups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management type. Subsequently, they have further expanded and deepened the segmentation by establishing the platform-based informal employment model and the optimization principle for Internet enterprise employees aged 35, thereby perpetuating the expansion of separation and instilling anxiety among all workers.